守住公心的循吏

□ 石志刚

古代循吏在读书为官期间，能够以公心对待工作。守住公心就成为他们的为官底色。怎么才能更好地守住公心，刘基的“四不”理论或许能为官员提供某种启示：“弱不可凌，愚不可欺，刚不可畏，媚不可随。”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不可欺凌弱者，不可欺骗愚昧者，不可畏惧强悍者，不可附合献媚者。

有的循吏出身于草野，天然有一种民本情怀，等到他们走上仕途后，能够竭尽全力地为百姓服务，做到“弱不可凌”。刘秀当皇帝后，名士费贻被任命为合浦太守。合浦北依丘陵，南临南海，是古代百越族居住的地方。费贻上任后，合浦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他能够站在百姓的角度，为百姓做实事。当地盛产珍珠，又圆又大，百姓以采珠为业。采珠民众过多，致使土地荒芜，粮食缺乏；奸商故意降低珍珠价格，拿少量粮食换取珍珠。如果费贻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变相加重了百姓负担。然而，费贻经过调查研究后，秉持着对百姓负责的态度，积极引进中原地区发达的农耕技术，在合浦大力奖励百姓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和蔬菜。他还亲自到农村指导农民生产劳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带领农民修建水渠、山塘，合浦农业得到快速发展，合浦百姓解决了温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当费贻因为任期满而离开合浦的时候，合浦百姓不忍其离开，攀辕百里相送。

古代循吏在为官生涯中，能够发现治政中存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遗余力地思考对策、打破陈规、废弃陋习，让官员能够摒弃杂念，让百姓能够减轻负担，试图达到“愚不可欺”的目的。明代名臣刘大夏，居官廉洁，关心民生。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他发现广州驿站没有人手。经过调查了解，刘大夏发现镇守太监王敬从中做了手脚。王敬将广州驿站的百名船夫私自提调外出搞副业，这些船夫搞副业所挣的钱中要拿出大部分钱交给王敬，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了广州驿站正常工作的开展，而且损害了船夫的正当权益。王敬看似聪明，实则对船夫搞愚民政策。刘大夏直接起草文书，废弃这一弊政，既有效保证了广州驿站正常工作，又切实维护了船夫的利益，还打击了王敬从中捞取钱财的不良行为。

古代循吏能够对具体事务详细参详，在掌握真实情况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策。即使遇到强力干涉或者利益集团阻扰，仍然能够排除阻力，着力解决难题，做到“刚不可畏”。宋仁宗时期的唐介，为官期间，敢于触碰豪族权贵，为百姓做主，做出了一番事业。唐介在岳州为官期间，有不法官员恃势为恶，为害乡里。当时有个宦官叫杨怀敏，他占着一处水塘，水塘之水经常淹没农田，给当地百姓造成水患灾害。杨怀敏利用水塘之水淹没农田之机，企图将受灾村民赶离田地。前任岳州官吏因杨怀敏背景深厚、权大势高，不敢依法惩办杨怀敏。唐介就任岳州沅江令后，发现杨怀敏之事，在深入调查取证基础上，明确了杨怀敏侵凌百姓利益的事实，毅然依法惩办了杨怀敏，维护了百姓的利益。

古代循吏在具体工作中，依据法律和事实，正确处置各类事务，试图做到“媚不可随”。宋朝名臣刘随，虽然名为刘随，却被誉为“邦之司直”。他总能在自己的各个任职上，不随陈俗、不畏权贵、不怕流言，按照事实本来的样子评人论事、处理问题。刘随在当大理寺丞的时候，负责断案。当时有一个叫李溥的官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敛财。李溥贪污之事败露后，此案牵涉到许多权贵，主审李溥案件的官员为了迎合皇帝之意，对李溥没有深究。刘随则不然，负责断案的他发现李溥案诸多疑点，再次弹劾李溥，使李溥最终接受了法律的制裁。刘随在担任右司谏的时候，江淮发运使钟离瑾利用职权，将数十艘船的奇花怪石运到京城，贿赂京城权贵。刘随了解了情况后，大胆地向皇帝谏言，让钟离瑾得到应有的惩处，因此刹住了奢靡和贿赂之风。

中国古代循吏

（上接1版头条）要炼就政治慧眼，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善于从政治上研判形势、分析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畏浮云遮望眼，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涵养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要提高政治站位，常观大势、常思大局，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高度看问题、作决策、干工作，从国家发展战略中找定位、抓机遇、谋发展，牢牢掌握领导工作主动权，奋力开拓改革发展新境界，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加强政治锻炼，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磨砺自己，做到矛盾问题敢抓、歪风邪气敢管、重大任务敢上、刀山火海敢闯，在大风大浪中培养大智大勇，在攻坚克难中实现能力跃升。要强化斗争精神，不怕事、不信邪，敢担当、敢负责，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亮剑、善于斗争，坚决防止和克服嗅不出敌情、分不清是非、辨不明方向的政治麻痹症，保持共产党人的风骨、气节、操守和胆魄，真正当好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者、维护者、推动者。

以深化标本兼治净化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生态是检验我们管党治党是否有力的重要标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意志推进正风反腐，彻底改变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旗帜鲜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标本兼治，切实把净化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把“严”的要求长期坚持下去，持续建设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着力提高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质量，有效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制度，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让党员干部在严肃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中经常接受政治体检、打扫政治灰尘，净化政治灵魂、永葆政治本色。要严格选人用人标准，认真贯彻好干部标准，始终把政治过硬放在第一位，完善知事识人体系，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真正把那些对党忠诚、勇于担当、能打硬仗、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好干部用起来，让真做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实干者得实惠，让混日子、熬年头特别是投机钻营者没有市场。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理念，抵制和反对关系学、“潜规则”。要持续加大正风反腐力度，压紧压实党委、纪委监委两个责任，充分发挥巡视巡察利剑作用，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强警示教育，扎牢制度笼子，规范权力运行，精准执纪问责，加快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有效机制，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上接1版二条）既然这三步不可能同步实现，在不同的阶段，针对不同的主要问题与中心任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就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并形成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阶段性创新成果。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逻辑，它服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民族复兴进程的需要。

从实践需要角度看，更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发挥何种作用。革命战争年代，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为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新胜利。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尤其是生产力决定作用理论为指导，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新世纪以来，面对以往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党强调更关注于人本身的整体发展。就关注人本身而言，强调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积极推进改革成果的共享，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整体发展而言，强调发展的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以及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系统思想发挥了有效的思想启蒙之功。百年的结合进程与成就表明，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指导人们摧毁一个旧世界，而且能够指导人们建立一个美好幸福的新社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主体

就运动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历史创造作用的过程。五四运动以后，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坚强的领导主体。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又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与作用。党是领导主体，人民是更为广泛的历史主体。这种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如何处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一般而言，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与丰富的领导经验，通过理论学习与深入调查研究来认知使命、了解现实、汇集民智、把握规律、设计政策，在更为自觉的层面上进行工作，人民群众相对而言则更为自发。自发需要自觉来总结、提升与引导，自觉源于自发、高于自发而指导自发，自发与自觉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这种自觉源于自发而又指导自发的机制集中体现在作为我们党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具体而有效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了群众路线的正确性和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这种自觉与自发的辩证统一并非能够自动实现。如果教条主义严重、思想僵化保守，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做好、对实际情况与群众诉求不了解，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就会出现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会受到挫折，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可以说，历经百年的经验、教训与成就，我们对中国化进程中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对于群众路线的重要作用与实现机制有了更理性的认识、更为深入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基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充分证明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发展与推进基点切实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五四运动时期虽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蔚为大观，随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将之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深入理解却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且产生于与中国现实与文化差别巨大的西方工业文明的语境之中。这种情况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很容易犯本本主义的错误，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具体观点视为理论上的天经地义与实践中的金科玉律。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强调要从实际的问题与需要出发来运用理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一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针对革命战争时期本本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有的放矢”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针对建设与改革中的教条思维，邓小平则更为直接地将实事求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就是要打破僵化认识的束缚与言必称经典、行必找依据的陈旧积习，形成人们对于实践与理论关系的正确理解，确立实践的优先性，面对现实问题，树立彻底的实践思维，灵活地结合理论，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大河之子

□ 崔庆

秦人牧马有方，得周赏封，最初的根据地在“西犬丘”，位于现在甘肃省礼县，这是秦的第一个都城。牧马必居水草丰茂之地，秦人以水为原点，寻找大河、开发大河成为了一种思维方式。

沿河而进

秦发展历史上历经了“九都八迁”，分别是西犬丘、秦邑、汧城、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咸阳。这些秦国都城有共同特点：一是大都分布在渭河北岸，沿河向东推进；二是大都扼守渭河干流和支流的交汇点，具有极强的地域辐射力和控制力。河流是大地血脉，占据关键节点，先得地利，这是秦人古老而朴素的智慧。

秦邑大体是现在的天水，位于散渡河和渭河的交汇处；汧城大体是现在的陇县，位于渭河支流汧河的上游；汧渭之会、平阳、雍城都位于现在的宝鸡，散布在汧河与渭河的交汇处；泾阳、栎阳、咸阳都位于现在的西安，散布在泾河和渭河的交汇处。由此可见，秦的前期发展史，其实就是开发渭河流域的历史，第一阶段主要经营渭河上游的散渡河流域，第二阶段是逐步开拓渭河中游的汧河流域，第三阶段是反复巩固渭河下游的泾河流域。

抓住发展中的关键元素，也就找准了发展的方向。根据现代考证，战国时代的关中地区温度高于现在，雨量充沛，水系较多，秦人近河亲水，找到了广阔的施展空间。

治水兴农

水之德，滋养万物，水之道，顺势而为。秦人与河为伴，以农战为本，自然形成了热衷水利的传统。秦人不仅仅利用天然河道，而且大胆向前迈出两步，一是改造河道，二是再造河道。都江堰致富巴蜀，郑国渠再造关中，皆是惊世之举，均收万世之利。

秦国设计修筑都江堰，既是改造自然也是利用自然，在岷江出山口“凿离堆，辟沫水之害”、开凿宝瓶引水口，“壅江作堋”、修筑鱼嘴分水堤，把岷江分为了外江、内江。不设拦水大坝，没有控制闸门，充分利用天然地形，因势利导，外江泄洪排沙，内江灌溉良田，成为匠心独具的经典工程。成都平原有了都江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造就天府之国。兴修郑国渠更是不畏其难，不舍其细，三百里干渠连通已有和新修的干渠、毛渠，融通关中水网。

都江堰修建于昭襄王末期，郑国渠修建于秦王政初期，这段时间恰是秦战略转型的关键期。秦逐步确立了吞并天下的整体格局，不再拘泥于一战之胜负、一城之得失，宏大目标需要更加稳固的基础，稳农业当务之急，兴水利重中之重。在兴修重大水利、集中发展农业中，秦不断完善自上而下的治理结构，形成了完备的动员机制，暗中涵养了惊人的爆发力，用于农则农兴，用于战则战胜。

军工一体

秦人不仅依靠河流寻求发展，还依靠河流开展军事行动，河和水都成为“神兵利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实现高效运输十分不易，战略投送能力和后勤补给能力往往决定了战争走向，秦对此有独到之处。

早在穆公时代，晋国遭遇灾荒，秦运粮救灾，强大的船队沿着渭河，在东西数百里的水路上连绵不绝，史称“泛舟之役”。到了昭襄王时代，秦伐楚国，在巴蜀集合万艘大船，搭载十万之众，携带粮米六百万斛，浮江而下，声势浩大。放眼当时，列国之内，知水用水莫有过秦者也。

秦人不仅知晓舟船之利，而且化水为兵，奇谋百出，成至刚至猛之威。鄢郢之战是秦楚相争的重要战役，其中攻克鄢城是水战的经典之作。鄢城是楚都郢的北方门户，防守完备，急切难下。然而，水利经验丰富的秦人异常敏感，在全面考察中捕捉到鄢城软肋，不惜大兴工程，在百里之外筑坝蓄水，修长渠引水攻城，坚城一鼓而下，杀伤楚国数十万军民，极大地削弱楚人斗志。此役所修水渠本为临时之用，因其坚固耐用，历经修葺，至今仍然灌溉几十万亩良田，是为“白起渠”。

鄢郢之战不是特例，公元前226年，秦再次用水攻发动灭魏之战。魏都大梁以坚城深池闻名天下，但秦人用水如神，改造周边水网，引黄河、鸿沟之水，漫灌浸泡大梁三月，魏终于城破国亡。在长期实践实战中，秦将军事和工程融为一体，军尤善工，工可为军，战略坚定，战术灵活，运筹天地之力，六国防不胜防。

帝国血脉

秦灭六国后，北却匈奴，南拓百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既动，当修河渠。于是北有秦渠，南有灵渠，打通帝国筋脉，抟力杀力如臂使指。

灵渠晚于都江堰约40年时间，渠首工程与都江堰鱼嘴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湘江之水三七分流，既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又增强灌溉调节功能，军民都可从中受益。正是有了灵渠作为补给生命线，五十万秦军才能安心南下，进退有据，拓展帝国版图。

沿河而进，秦得水之利，更思水之德。战国之争，不仅是金戈铁马，还有民心所向。诸侯各国筑坝开渠大都各自为利，如魏国白圭治水甚至以邻为壑。还有各争水利、有悖天时，居然出现了“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极端情况。水之德在容，秦之水利虽首为国家之需，却恰恰展现了共享惠民的另一面，这是一种纵观全局的气魄，默然之间无疑有巨大感召力，六国之民入秦务农就不足为怪了。昭襄王以降，秦国开创了系统工程的黄金时期，一些工程历经两千年，依然如故、造福一方，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记忆。

了解秦人对水、对河的情感，也就理解了秦人对河西之地的特殊挂念，理解了秦人沿河东进的执着，理解了秦至始皇，终尚水德，以黄河为德水。水火为天地之力，周为火德，秦为水德，秦取而代之，抛去阴阳五行的神秘面纱，水火之争是优胜劣汰，善者为之。如果说火是防御性要素，让人别于自然，那么水就是发展型要素，让人融于自然，秦以江河为血脉，自得天地之助。

雄关漫道，以人为峰。金城千里，岂可易得！秦人五百年栉风沐雨，走过山山水水，大河之子终成大地之主。

秦变